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朱宝琴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1933年, 中日签订《塘沽协定》, 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 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 日本“藉端生事”, 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 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 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 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 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关键词: 藏本失踪; 蒋介石; 汪精卫; 应对

中图分类号: K 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2)03-0076-05

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的《塘沽协定》不仅暴露了蒋汪合作的南京国民政府因“剿共”心切, 实施对日妥协政策的本质, 还为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 南京发生日本驻京副领事藏本英明因仕途失意单身出走事件, 日本方面一面虚声恫吓, 藉端生事, 一面将长江舰队调至下关, 散布“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消息”^[1]。中国首都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江西督剿红军的蒋介石与留守南京主持外交、行政的汪精卫顽固坚持媚日妥协和加紧“围剿”红军的内战政策, 联手应对, 搅得石头城上下鸡犬不宁, 直至汪精卫派人寻找到藏本, 转送日本领事馆。本文利用台湾近期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外部周刊》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相关资料, 试图从日本侵华及中国国内政局变化的大背景审视藏本失踪事件和蒋汪应对的全过程, 进一步揭示日本扩大侵华与南京国民政府决策的互动关系。

《塘沽协定》后, 坚持认为这些损失换来“剿共”, 以在“东南数省次第肃清”, 并非“得不偿失”。^[2]同年10月, 蒋介石出动近百万兵力, 对中共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 其中以50多万兵力对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采取“堡垒主义”的战略“剿灭”。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坚持内战的政策激起国民党内爱国将领的强烈反对。11月20日, 被调往福建进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联合“第三党”和国民党内部将领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州事变”,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不久, 又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3]407}

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斥责为:“自立名目, 实行叛乱, 同时勾结共匪, 助其肆虐。”^[4]并调集15万兵力入闽“讨伐”, 1934年1月下旬, 福州事变以失败告终。同年2月, 蒋介石亲抵南昌行营继续督剿红军, 并在告诫国民党军全体将士的通电中表示:“一本初旨, 与我诸将士共同生死, 誓灭残匪。”^[5]据此, 日本方面分析认为:“蒋介石为剿灭共军尚须付出更大努力”, 他“为了一面完成剿共, 一面完成统一, 至少需要同日本继续保持休战状

1933年5月, 南京国民政府于签订屈辱的

收稿日期: 2012-03-16

基金项目: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

作者简介: 朱宝琴(1949-), 女, 江苏江都人,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

• 76 •

态”。因此断定会继续出现“对日妥协政策的动向”。同时,日本也认识到“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中国民众的国民意识迅速高涨”,尤其“北方的抗日气势高涨”,中国“排日抗日的民族潜在势力仍然很强”。日本对《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表面渐呈缓和,但在其背后,中国潜在的反满抗日不断活动”^[6]的局面耿耿于怀。于是一面通过与中方就关内外通车通邮等问题的所谓“善后交涉”巩固扩大《塘沽停战协定》所形成的有利局面,另一面企图通过制造纠纷、强行交涉,^[7]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满足日本不断扩大在华权益的要求。而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确定的对日方针是:“除割让东省热河承认伪国,为绝对不可能外,对其他次要问题如税则等仍应与之作相当之周旋,谋适宜之处置,并极力避免一切刺激日方情感之行动,及言论。”^[8]故此后不久在中日双方就《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谈判中,黄郛、何应钦等秉承蒋汪旨意尽力妥协屈从,使日本在关内外通车、通邮等问题上要挟不断得逞。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则独霸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声明,叫嚣: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不得不加以反对……对于向中国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军事借贷等,日本更不能置之不理。^[9]这一声明不仅使世界舆论哗然,遭到英美的反对,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南京国民政府不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措施予以反制,而是表现出媚日的姿态。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与别国的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即使是军事项目,亦“大都为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故日本“不必有所顾虑”。^{[3]408}两个月后,中国首都南京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蒋汪的联合应对,进一步彰显了日本“藉端生事”的本质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的媚态。

二

1934年6月8日晚,时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的藏本英明,在同僚前往火车站为日本驻沪公使有吉明来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外交部宴会送行间隙,只身出走。9日上午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田中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口头照会,藏本英明失踪,要求“搜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旋即通

知首都军警当局“严密搜查,务期明了真相”。与此同时,日领事馆派员来到首都警察厅要求查清藏本英明失踪事情。首都警察厅陈焯对来自国民政府外交部的训令和日领事馆的责难不敢掉以轻心,当即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派督察长陈独真访问日本领事馆,进一步了解藏本出走的详情及个人嗜好。二是将藏本近照翻印张贴全城各处及城关站埠,并派员四处查访,对日本领事馆附近及藏本寓所阴阳营及下关一带沿路岗警作为查访重点,结果未发现蛛丝马迹。

当日蒋介石得到戴笠电告藏本失踪事件后,虽复电训示:“应注全力侦查,即日判明下落,具报,勿稍疏懈。”^{[10]294}因全力注重“剿共”,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6月10日,由督剿前线返回庐山后的蒋介石上午游览庐山黄龙寺,下午拟定本周工作计划中仍“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10周年纪念,并将应对攻打红军“进剿计划”相关的催订重炮武器、“审订空军预算”、“整理投诚赏项”^{[10]294}作为工作之重。

南京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放弃星期日休息,召集各局队所所长官研究扩大访查办法,继续尽力寻查。并派人前往藏本寓所慰问家属,表示保护外侨之重要。^[11]

6月11日,蒋介石得悉藏本仍未寻获,停泊在南京长江上的日本军舰已褪下炮衣,汪精卫电嘱蒋介石“请勿回京”,料定事态严峻。蒋分析认为,日本以藏本事件为威胁,无论其事真伪,“而其威胁时期以难再缓,然其在南方只有用威胁手段,使我屈服。决不能用其陆军强占华中,以其对俄情势,亦日急一日,故其唯有用海军之力。一面虚声恫吓,藉端生事,使寻人无准备之余暇而已。吾人当看破之弱点所在。”以“先其所爱,征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之原则以赴之。于是致电汪精卫曰:“右壬(于右任)尚未到庐,未知对方有何要求,或新消息否?弟意此事须竭力设法,勿使其陆战队登陆入城,一面嘱益之(朱培德)兄作南京现有军警兵力之准备,以防万一。”又致电朱培德曰:“日副领事失踪事,一面应静以处之。以待其事态之变化,一面应秘密准备在京所有之兵力,以防万一。但必须以静制动,切令军警勿稍形张皇为要。”^{[10]298}显然,蒋介石要求首都军警对日保持“隐忍”姿态。同时,蒋介石为协调安抚两广实力

派陈济棠、李宗仁，特发出机密电文称：“世界战云，幻变愈急……吾人生逢其时，适当其冲，责无可诿。能否力图自赎挽救危亡，亦只余此最迫最促之机会。中正见闻较切，忧心如焚。两三年来，只期纠合全国之力量以清心腹大患之赤匪并融洽各方之意见，共拯空前未遇之困难，埋头苦干，自信恩怨浑忘，成见悉捐，苦心孤诣，原不求世人悉谅，第蓄意捣乱者，仍挟其造谣挑拨之惯技资为簧鼓别有会心，当此国命不绝如缕之时，岂容纠纷再起，自促灭亡。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仍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10]299}在中日关系因藏本失踪事件势如燃眉之际，蒋介石此时发出上述极密电文不外以下原因：

首先，蒋介石对陈济棠、李宗仁心存芥蒂。1931年5月陈李在广州联街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各派虽在“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旗帜下暂时统一，内部纷争从未停息。蒋用镇压和分化瓦解手段解决了“福建事变”，但对分掌两广实权的陈济棠、李宗仁放心不下，唯恐生变，实有“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电文强调：“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之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弦外之音是：地方服从中央，一切行动听指挥。

其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云“两三年来，只期纠合全国之力量以清心腹大患之赤匪。”电文虽未涉及藏本失踪事件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但已为对日交涉中的妥协埋下伏笔，预设不得借对日妥协作为反对派的口实，故强调“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定后，凡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标治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

其三，兵力不足，蒋介石心有余悸。藏本失踪事件前几日，蒋念“江西兵力不足”电张学良、何成濬曰：“限本月卅日以前将五十一师调集襄花路一带，候令调至江西进剿。”^{[10]246}“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1]。藏本失踪后，蒋介石为防止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入城，虽致电朱培德采取了两手准备，但对南京城内仅存的军警兵力心知肚明。此间致电两广实力派不排除有临时调兵应急的可能。电文开宗明义：“世界战云，幻变愈急，宗邦运命，渐达最后之试验时期。

吾人生逢其时，适当其冲，责无可诿。”在做出以上应对决定后，蒋介石对汪精卫“请勿回京”的告诫思虑再三。汪精卫指出：“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无益也。”^{[10]46}汪蒋在“攘外必先安内”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剿共”战争关键时期，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改弦更张的。他分析认为：“一，预防倭寇海军在京登陆，藉口保护其领事馆。二，预防倭寇待余回京，提出哀的美敦书。三，倭寇间接或非正式要求。四，倭寇要求之程度。五，倭寇诱引谈判此皆意中之事，故余回京无益而有有害也。”最终，蒋介石决定“注意藏本事，以定行止”^{[10]302}。至于藏本失踪事件的交涉，则由留守空城的汪精卫处置。

三

藏本失踪后，主持外交、行政工作的汪精卫如坐针毡。日本提出警告，要求于48小时内搜查其下落。首都宪警连日极力搜索，仍无下落。“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1]汪精卫哀叹：“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1]

1934年6月11日，汪精卫按蒋介石来电所示，一方面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沈覲鼎前往日本领事馆拜访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面达政府重视此事之意，并谓现正督饬宪警尽力彻查，劝日方持镇静态度，勿过于张皇，并托其向藏本副领事家族，代达慰问之忱”^[11]。一方面召集“朱益之（朱德培，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唐孟潇（唐生智，时任南京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1]。汪精卫根据蒋介石对日“先其所爱，征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之原则，当晚决定两项措施：第一，派员赴沪，谒见日本公使有吉明，报告国民政府重视藏本副领事失踪一事及连日宪警竭力搜查情况，乞求“日方务取镇静态度”。第二，举办南京户口总检查。具体实施细则如下：（一）由警厅令饬各局切实检查，并分派户籍人员指导，实地观察，搜查材料，注意人口增减迁涉，并严密考察特种户口之变动情况。（二）宪警均派便衣队多人，携带照片，分向京内及近郊可疑之处，四处查访。（三）由江宁县政府转饬各乡

镇长,负责搜索。除登报悬赏寻访外,并布告各乡镇悬赏寻访。(四)派员分赴苏州、无锡、镇江各处查访。^[11]

6月12日,日本公使有吉明对中方面达情况虚伪地“深表同意,并对中国当局关切极表感谢”,却又派员抵达南京配合总领事馆向中国外交部施加压力。^[11]

自6月11日夜,南京宪警实施的户口总检查由市区扩展到城郊及沿江管辖区域。南京城里城外,形迹可疑者、方言不通者、面貌奇异者、似有精神病状者都成了重点探查对象,重赏告示布满了全城要道。南京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韩文煊、警察厅警察处处长金斌秉承上级旨意接连几天亲自参加探查工作,但直到6月12日晚,仍无藏本线索。

6月13日上午,军警当局接到明孝陵附近居民举报线索,当即派人寻觅,至中午,终于在明孝陵后山发现了神情沮丧、蓬头垢面、身着西装的藏本。经查姓名、校对照片,确认是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无疑,旋即带回警厅。

藏本意外寻获,使汪精卫如释重负,南京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喜形于色。外交部、首都警察司令部、行政院、参谋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纷纷派要员到警察厅探视藏本,以示关怀。

藏本对于出走原因一再表示:“我不愿说,回领事馆后,也不愿发表。”但他强调:“我一身存亡与贵国均无关系,我今重回,贵国无负于我。”^[11]首都警察厅特务组“为避免日方另有藉口”,特约请驻京美联社记者、路透社记者来警厅,“慰问藏本”,以“取得藏本承认系自动出走口头凭证”。^{[10]309}

当晚,蒋介石得悉来电,称“藏本已寻获”经“多方盘询,悉渠自庚晚送有吉行后,即乘黄包车出中山门,登紫金山,欲自杀者数次。对其出亡与欲自杀之原因,不外渠与磨总领事不洽,因渠属外交系,须属陆军系,须平日对藏本事事予以难堪,尤其此次须磨宴有吉,藏不与焉。……”^{[10]308}蒋介石十分欣慰,暗自庆幸,称:“藏本旬获,倭寇无威胁之机,故得暂免祸患。此实天佑中国之兆也。”^{[10]385}

6月14日,日领事馆派须磨等人进见汪精卫,诡称:“过去疑云已一扫而空,两国邦交益

见好转”,并掩饰说:“藏本副领事8日晚之出走,系一时神经衰弱,毫无其他原因。”^{[10]310}汪精卫连称“欣慰”,并祝愿藏本早日恢复健康。送走须磨后,对日“执持谦下态度”的汪精卫掩饰不住侥幸度过危机后的兴奋,致电蒋介石称:“须磨奉日政府令于午后四时来谒,关于藏本寻获事件,对我政府及宪警深表谢意。并称经上海派来松井医生之诊断证明藏本实患极度之神经兴奋,致有此等举动云云。”并告慰:“蒋先生可以回京。”^{[10]310}日后,汪精卫自吹:“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是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1]日方为掩饰家丑和藉端生事的阴谋,派日警将藏本及其眷属“护送”回国。随着藏本的押解回国,笼罩石头城的藏本失踪阴云暂时消退。

1934年藏本失踪事件和蒋汪的联合应对,使我们对日本策划全面侵华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内外政策的互动关系增加了理性思考。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应视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前奏。藏本失踪事件发生后,日本各报评论蜂起,一口咬定,不是说被“兰衣社”拉去,便是说“衫山交涉”再起,血口喷人,满腔恶意。^[12]日本政府也放话威胁。据日本《大每》夕刊载东京消息称,广田外相在十二日之阁议报告事件真相,同时关于我方应行使之一切解决手段,该项训令共分二段,以期彻底的解决,表示断然之决议,其要旨如左:“藏本事件系在中国国都尤以在警备严重之区域公然对我总领事馆员之行为,不论加害者之行为及动机如何,实关系帝国威信之重大案件,故须彻底纠弹南京政府之责任。帝国政府保留最后行动之自由,并要求中国自行着手探索藏本。若对于该提议中国政府不表示诚意,帝国政府第二段之行动,而认中国以无组织国家之常例,无搜索之能力,我派出之官吏,当举行实力搜索,若达最恶之场合时,当使我陆战队当实力搜索之任。帝国政府依照惯例,对于关系列国,通告我方所采取一切手段之公正妥当。由中国方面或由我实力搜索之结果,判明事件之真相后,当使我有吉公使与国民政府开始正式谈判,提出左之条件。一,国民政府之正式谢罪。二,加害者之严重处罚。三,严正之损害赔偿。四,对于将来之保障。最后并主张将来若再有此种不详事件发生,帝国政

府有取自由行动之权利。”^{[13]28}

藏本寻获后，“日本方面对藏本已恨入骨髓”，据日本《大每》夕刊载：“骚动一时之藏本，对于宪兵司令部谷正伦告自为自杀而失踪之经过，又对于外交部人员与中国外国新闻记者，无耻的述其失踪原因，谓系对于总领事馆之待遇不满云云。已由中国方面发表，然由藏本归领事馆后至情况判断，可以证明中国方面之公布为不虛，又对于中国方面与被告同样之讯问，虽完全无回答之理由，然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分，不特答复中国之讯问，且连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故领事馆员全体对之悲愤慷慨，须磨总领事亦视被自己所养之狗反噬。”^{[13]31}甚而至于，意大利墨索里尼也对此发表意见称：“日本力图逐步成功其克服中国之谋，藏本事件，实为一种警示，同时亦为一种发始点，藏本之获得，日本不过失去其机会，然其计划则仅暂时展缓而已。”^{[13]47}

其二，藏本的意外寻获，虽暂缓了日本的藉端生事，却留下了无穷隐患。蒋汪在联手应对中，“因却于日本不测之祸”，态度极为“谨慎恐惧，极力负责”。诚如《大公报》社评指出：“此数日中，中国政府几于搁置一切政务，专办此案，南京军警，昼夜活动，数十万居民，挨户被搜，城厢搜毕，并及四郊。当局之焦劳，人民之惊慌，皆超越想象，不可形容。”“幸而于藏本未饿死之前发现，若再迟一两日，其人已死，毫无对证，中国将受如何‘处置’？又幸而藏本氏未投身江流，不然，中国亦不知受冤枉至如何境界？是以苟根本上不存善意，则中国可以时时遭殃”^[14]。历史已证明，日本“藉事生端”、“迂机辄发”正是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应对藏本失踪事件上，蒋汪都有使“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挠动”并“竭力设法”勿使日本“陆战队登陆入城”的考虑。在蒋介石是否回京的问题上，蒋汪也是意见趋同的。但留守空城的汪精卫和掌握兵权的蒋介石在应对上仍有区别。汪精卫按蒋介石的指令，对日斡旋中百般隐忍，媚态十足。在未有证据证明中国为加害方的情况下，不断督饬首都警察厅、首都警备司令部加紧侦查，“如有怠忽，定当严惩处，决不宽容”。并严防“有奸人乘机图谋破坏政府威信”。^{[13]5}对日本政府的威胁，汪精卫从不加以驳

斥，还多次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领馆求日方持“镇静态度”。藏本若侦查无果，汪精卫则会在对日交涉中一如既往地妥协退让，因为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汪精卫是下死力支持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对藏本失踪采取了“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两手准备。他既支持汪精卫对日斡旋妥协，又指令和秘密准备在京兵力，以防万一。若形成“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局面，则可以出现使日本进得慢一些，以利“剿共”战事的进行。故为了防止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获反蒋口实，或应对时兵力不足，蒋介石向两广实力派发出密电，晃动橄榄枝。这样，“国命不绝如缕之时，岂容纠纷再起”或“世界战云，幻变愈急”之际，调动实力派“挽救危亡”“责无可诿”，当在情理之中。总之，蒋、汪联合应对藏本失踪事件的目的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 [1]蔡德金. 西安事变前后的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J]. 研究、资料与译文, 1985(2): 43-59.
- [2]汪精卫. 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M]. 重庆: 独立出版社, 1938: 10.
- [3]张宪文. 中华民国史纲[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4]周美华.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第23册[M]. 台北: “国史馆”, 2005: 494.
- [5]周美华.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第24册[M]. 台北: “国史馆”, 2005: 419.
- [6]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上册[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245-247.
- [7]彭敦文.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86.
- [8]杨天石. 黄郛与塘沽协定的善后交涉[J]. 历史研究, 1993(3): 73-87.
- [9]黄美真, 郝盛潮. 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39.
- [10]袁惠常.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 第26册[M]. 台北: “国史馆”, 2006.
- [11]外交部情报司. 藏本事件本日军警扩大搜查之情形, 藏本在警厅之情形及向敬厅当局之谈话[J]. 外部周刊, 1934(15): 16-19.
- [12]喜剧的藏本事件[J]. 国闻周报, 1934, 11(24): 1.
- [13]沈觐鼎. 藏本失踪事件之始末[M]. 正中书局, 1934.
- [14]张季鸾. 藏本案之大白[N]. 大公报, 1934-06-14(3).

(下转第 108 页)

居学术会议,2009.
[32]周延.扬州“双东”历史街区的空间形态与建筑艺术特色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

[33]张燕.扬州砖雕艺术初探[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135-139.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Yangzhou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WANG Xiao-qian, GUO Wei-min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Yangzhou is one of the Chinese famou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In its old city there remain a big number of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at are of great cultural value and architectural value. The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Yangzhou traditional dwellings began in 1950s and 1960s and there are three main stages in its development till now. The research involves many fields such as architecture, history, culture, art, and so on, and has obtained some results in th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features, characteristics of salt merchants' buildings and architectural brick carving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object, content and method of research.

Key words: Yangzhou;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architectural features; review

(责任编辑 子清)

~~~~~  
(上接第 80 页)

## Kuramoto Incident and the Joint Respons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ZHU Bao-qin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Tanggu Agreement* was signed in 1933, Japanese government swelled in its ambition of invading China. On June 8, 1934, the vice-consul of the Consulate of Japan in Nanjing, Kuramoto, was missing, and Japan attemp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incident to make trouble.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made joint response to it in order not to “affect” the military manoeuvre of “suppressing the Communist”. Under the command of Chiang kai-shek, Wang Jingwei tolerated Japan full of obsequiousness. Although Kuramoto was found at last, the incident left behind much hidden trouble and it further exposed the real attitude of the Chiang-Wang National Government toward Japan.

**Key words:** the missing of Kuramoto; Chiang Kai-shek; Wang Jingwei; response

(责任编辑 子清)